

# 第一章 緒論

2002年5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與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在莫斯科簽署「美俄裁減戰略攻擊武器條約」（Strategic Offensive Reductions Treaty），簡稱「莫斯科條約」。其條約內容如下：

- 1' 第一條－規定美俄兩國在十年內分別將目前各約 6000 枚的戰略核彈頭，削減到各剩 1700 至 2200 枚。
- 2' 第二條－「裁減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START）仍然有效，除非兩國同意延長，否則該約將在 2009 年失效。
- 3' 第三條－建立雙邊執行委員會，每年至少集會兩次，以討論條約執行的透明度及其他可能發生的問題。
- 4' 第四條－確認本條約需經兩國國會依憲法程序通過後，於交換批准書之日始生效。條約有效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5' 第五條－按照「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第 102 條規定，本條約需向聯合國備案。<sup>1</sup>

難能可貴地，此約實屬美國對俄羅斯的重大讓步，因為在兩國國力對比懸殊的今日，普欽能爭取到雙方各自裁減約三分之二的長程飛彈核彈頭，等於是為美俄間軍事戰略的失衡狀態進行結構凍結，防止差異再度拉大！如果本約能獲得締約國的認真對待，那麼普欽的對外成就將值得大書特書。不過條約畢竟沒有強制力，註定了美國不會坐等俄羅斯趕上其戰略優勢，美俄之間的蜜月期是極其短暫的。該約言猶在耳，2002年6月12日，美國就片面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同時開始於太平洋進行「海基中途防禦」（SMD）飛行計畫測試，測試新開發的「標準三型」（SM-3）導彈。<sup>2</sup>俄羅斯雖然隨後在14日也宣布退出「第二階段裁減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START II）作為反制，<sup>3</sup>不過此時的俄羅斯國力已不容普欽做出過激反應。

<sup>1</sup> “Text of Strategic Offensive Reductions Treaty,”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5/20020524-3.html>.

條約內容中文部分請參考：董更生編譯，「美俄簽署裁減核武新約」，*聯合報*，25 May 2002, p. 11。

<sup>2</sup> 林寶慶，「美進行海基飛彈防禦測試」，*聯合報*，14 Jun 2002, p. 14。

<sup>3</sup> 王麗娟譯，「俄退出第二階段限武條約」，*聯合報* 15 Jun 2002, p. 13。

一旦美國完成國家以及戰區兩大飛彈防禦系統（National Missile Defence system & TMD）的部署，將會擁有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戰略霸權地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能力威脅其軍事優勢。其他國家雖無法苟同卻也難以望其項背，只能消極地以非軍事方式防堵美國的單邊主義再度向全世界擴散。有冷戰時期美蘇對峙的前車之鑑，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能力再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Arms Race）。美國只要維持既有發展步調，其戰略優勢就可持盈保泰；反觀其他意欲迎頭趕上的國家，卻因後發劣勢而必須賠上經濟發展來整軍經武。當然這是指沒有意外的時候。眾所皆知九一一事件過後，資本主義國家處處瀰漫著恐怖主義威脅的氣氛，反恐怖主義戰爭成爲了美國邁入新世紀後一段時間的主要戰略目標。以目前美軍深陷伊拉克泥沼的局面來看，美國要在全球戰略佈局上成爲霸主還需要一段時間。俄羅斯仍可在全球戰略佈局上佔有一席之地，當然這就取決於普欽執行軍事改革的成效良窳了。

##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研究標的, 界定題目, 界定範圍, 議題背景, 解決什麼問題]

[研究動機: 問題的重要性, 為什麼這個議題值得研究]

本論文旨在探討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裁併「戰略火箭軍」(the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SMF, SRF or RVSN) 至空軍 (the Russian Air Force) 編制內的原因。1957 年 10 月, 蘇聯成功發射「史普尼克 I 號」(Sputnik I) 衛星, 將世界帶進了洲際彈道飛彈的時代。1960 年 1 月, 赫魯雪夫 (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 爲了因應國際戰略以及國內政治生態的新形勢, 戮力催生的戰略火箭軍正式成軍。2000 年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 (Igor D. Sergeyev) 與總參謀總長克瓦什寧 (Anatoliy Kvashnin), 彼此爲了軍事改革的戰略大方向唇焦舌敝、交相指摘, 鬥爭已激化到血濺五步的程度, 普欽必須快刀斬亂麻、兩害相權取其輕做出抉擇來。同年 8 月 13 日, 普欽作出將戰略火箭軍裁併至空軍的決議; 2001 年 3 月, 普欽改組內閣, 在權力爭奪戰中落敗的謝爾蓋耶夫默默下台, 長久以來關於戰略火箭軍是否需要裁併的爭議終於告一段落。本論文試圖回答下列問題: 戰略火箭軍挾其強大的毀滅性核子嚇阻武力, 在蘇聯的對外關係與軍事戰略方面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 在蘇聯各軍種之間自始至終一直享有優渥的地位。然而, 地位曾經如此崇高的戰略火箭軍爲何最後卻又被決議裁併到空軍? 本文期盼透過對於俄羅斯裁併戰略火箭軍原因的探討, 了解俄羅斯克里姆林宮內部權力鬥爭的概況; 同時對於目前軍購議題炒得沸沸揚揚、努力邁向完全志願役專業化部隊 (volunteer professional army) 轉型的台灣而言, 俄羅斯的軍事改革歷程也可供借鏡。期望本論文能在評估國家戰略上的軍隊「最適規模」以及戰略目標上有所助益。

## 第二節 假設命題與研究架構

### 假設命題

本論文假設：在蘇聯解體後，戰略火箭軍之所以遭到裁併至空軍，乃是受到克里姆林宮政治生態以及傳統嚇阻戰略理論修正兩項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此一命題又可以衍生出下列邏輯相關子命題：

- 1 • 二次大戰結束後，核子武器的問世改變了蘇聯的軍事準則。赫魯雪夫以及領導階層相信未來戰爭的型態一定是核子大戰，蘇聯必須預作準備，發展核子武器以及載具技術。戰略火箭軍因而受到領導階層的高度重視，不論研發、訓練或維修工作皆不遺餘力。該軍種是推行蘇聯對外政策與談判的重要工具，甚至本身就是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蘇聯領導者選擇銳意改善其陸基核子武力並且也獲得空前未有的成就，因而更願意追加投資戰略火箭軍的發展。終於在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時期戰力達到了最高峰，與美國達成嚇阻平衡的狀態。不過也正因過度挹注資源在軍事力量上，蘇聯經濟早已衰弱不堪，無力支撐軍備競賽。繼任的戈爾巴秋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必須以「合理的充分性」（reasonable sufficiency）新軍事準則，謀求與美國和解並同時進行裁軍來發展經濟。在論文中有關於戰略火箭軍所使用的彈道導彈型號，因資料來源之故選擇以西方國家研究機構所編列的型號為準。
- 2 • 蘇聯解體後，葉里欽（Boris Yeltsin）爲了鞏固自身的政治權位，不斷分化對外暨國家安全政策領域的決策架構。在缺乏健全結構、權責混淆的環境下，相關組織、機構機能疊床架屋，眾「強勢部門」（power ministries）各擁山頭、群雄割據，例如「國防部」（the Ministry of Defense）、「外交部」（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總參謀部」（the General Staff）、「聯邦安全會議」（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國防會議」（the Defense Council）、「國家軍事監察署」（the State Military Inspectorate）、鐵路部隊以及「緊急狀態部」（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Situation）等等。這些強勢部門往往必須競逐葉里欽的支持才能維持自身生存。制度因素讓葉里欽有機會進行分化動作，防止軍事權力過度集中，並藉機整肅反對勢力。軍事改革常常因爲軍方決策高層更迭頻繁、各機關互相牽制，造成政策上的不連貫或是停滯，成效也因而大打折扣。
- 3 • 由於經濟資源極爲有限，使得軍中社會問題嚴重惡化，拖欠薪餉、住宿

問題、兵源欠缺、犯罪率激增以及士氣低落等情事層出不窮。部份軍方決策高層爲了維持基本生存，或是基於本位主義，不願意配合裁減兵員及軍備，反而發展出自己一套、關於詮釋武裝力量最適規模之理論基礎，企圖爭取有限的經濟資源挹注到自己所屬軍種或部隊。

## 章節安排

本論文將根據上述假設命題以及衍伸出來之相關子命題，設計相對應的章節安排。本文一共分爲六章：

- 1 • 第一章 緒論。本章將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假設命題、研究架構、文獻述評與研究途徑。
- 2 • 第二章 戰略火箭軍之歷史沿革。本章旨在說明從赫魯雪夫開始，歷經了布列日涅夫時期，一直到「八月政變」發生前爲止。基於嚇阻戰略，以戰略火箭軍爲代表的戰略核子武器在蘇聯對外關係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以及其在技術層面上，佔有何等優勢？在這個階段中，戰略武器技術層面上有了長足的進步，美蘇之間已達成「嚇阻均衡」(Deterrence equilibrium) 狀態。蘇聯方面以戰略火箭軍爲代表的第一擊武力略勝美方一籌。美國方面的優勢則在於第二擊武力，不論是空基戰略轟炸機亦或海基戰略潛射彈道導彈均遙遙領先蘇聯。沒有任何一方有能力越雷池一步。而到了戈爾巴秋夫時期，有鑒於國力江河日下，加上美國雷根總統對蘇聯態度益趨強硬，自忖不能再繼續擴張軍備。蘇聯的軍事準則遂急轉直下，改以其「政治新思維」(New Political Thinking) 作爲基礎，克里姆林宮的領導階層開始認真考慮以裁減軍備來爭取發展經濟的喘息時間。戈爾巴秋夫上台後積極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並片面裁減軍備。
- 3 • 第三章 葉里欽的親西方 (pro-Western) 對外政策與建軍路線。本章旨在闡述葉里欽時期的國家安全概念，那就是維持俄羅斯在原蘇聯地理範圍內的影響力、對內全力發展經濟、對外尋求與西方世界和解以及繼續裁減軍備。蘇聯解體後葉里欽矢志整合獨立國家國協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武裝力量，但苦於當時的國力力有未逮只好自行建立一支屬於俄羅斯聯邦自己的軍隊。在建軍初期，葉里欽不論是在政治、外交、經濟乃至於軍事層面，都希望能夠進行激烈而大幅度的轉型工作，冀望以最少時間爭取到結構上的轉變。他爲了發展經濟，只好繼續裁減軍備，緩和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緊張局勢，所以此時俄羅斯的對外路線有著濃厚的親西方色彩。然而事與願違，葉里欽不但沒有爭取到西方國家的積極支援，反而因爲經濟改革太過激烈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東擴、美國不斷擴張戰略優勢等問題，而引發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鬥爭，讓葉里欽應接不暇、疲於奔命。雖然 1993 年以鐵腕作風強行解散國會，但是仍然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必須與國會進行妥協，1993 年底「俄羅斯聯邦軍事準則基本章程」的出爐就是府會妥協下的產物！
- 4 • 第四章 軍事準則辯論中的政治因素。本章將按照時間順序，從 1992 年 12 月，新國會改選、新憲法實施開始，一直到 1997 年 5 月謝爾蓋耶

夫出任國防部長為止，論述關於俄羅斯軍事改革路線的辯論，以及衍生出來的政治事件。在葉里欽第一任總統任期裏，國防部、外交部、總參謀部以及聯邦安全會議等眾強勢部門間爭鬥傾軋愈演愈烈，府會衝突仍未停歇，又適逢第一次車臣戰爭失利，軍事改革工程一事無成。不過，證據確鑿的是葉里欽其政治性格已深深阻礙軍事改革的進程。他最慣用的政治手腕莫過於「眾建諸侯少其力」，藉由憲法外的組織機構分化部屬權力。在政府組織架構尚未制度化、權責明確劃分之前，放任重門疊戶的組織機構彼此惡性鬥爭，好方便他分而治之。

- 5 • 第五章 普欽時期的建軍路線以及裁減戰略火箭軍。本章將闡述普欽的建軍路線，以及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與總參謀長克瓦什寧間的政治鬥爭過程。2000年，國防部與總參謀部之間的鬥爭趨於白熱化，謝爾蓋耶夫以及克瓦什寧都在追求軍事改革的議題詮釋權。結果是曾任戰略火箭軍總司令的謝爾蓋耶夫落敗，2000年8月13日普欽基於政治考量及經濟因素，做出裁併戰略火箭軍的決定；隨後2001年3月普欽改組內閣時，總參謀長克瓦什寧獲得留任，他的對頭謝爾蓋耶夫則黯然離開國防部長職務，整個關於戰略火箭軍存廢與否的政治角鬥才到此告一段落。
- 6 • 第六章 結語。

### 第三節 文獻述評與研究方法

#### 文獻述評

在關係戰略火箭軍整併與否的最關鍵時期，也就是葉里欽兩任總統任期裏，聯邦政府組織架構欠缺一套完整成文的法律制度規範，缺乏一套文人有效控制、議會能以監督國家安全系統的機制，更遑論西方國家行之有年的憲政慣例，這也就讓葉里欽有機可乘！他拉攏並利用軍方的政治參與，有效地掌控軍權並且打擊政治對手。政府體制疊床架屋、各行其是，葉里欽也習慣藉由制度因素，對各強勢部門與準軍事部隊展開分而治之、眾建諸侯少其力的政治手腕，鼓勵各機關組織彼此爭權奪利而有求於他的仲裁來鞏固自身政治權威。當然，並不是只有俄羅斯才有行政官僚間的競爭以及政策的不連貫。這些問題在許多國家其實是屢見不鮮的，例如美國。但是這些問題在俄羅斯卻是特別地尖銳且激烈，美國蘭德智庫（RAND）學者拉瓦貝（F. Stephen Larrabee）與凱拉席克（Theodore W. Karasik）分析主要的原因有三點：

- 1 • 俄羅斯的政治和社會正處於激烈的變遷狀態。
- 2 • 新的決策結構十分脆弱，而且沒有明確、成文且行之有年的制度根基。
- 3 • 對於俄羅斯國家利益的看法分歧，沒有共識。<sup>4</sup>

拉瓦貝與凱拉席克又說，俄軍被迫捲入克里姆林宮政治泥沼中並非貪圖一呼百應的政治權力，所爭奪的只是發言權，也就是接近葉里欽以求改善自身基本待遇的機會。軍方（包括戰略火箭軍）依然不是克里姆林宮政治遊戲中的主體，只不過是廉價的政治工具。在政治危機紛至沓來的建軍初期，俄羅斯的軍事改革工作仍僅止於空轉。一切問題不見解決，反而愈形惡化，例如軍中社會問題嚴重惡

---

<sup>4</sup> F. Stephen Larrabee and Theodore W. Karasik,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Decisionmaking Under Yeltsin* (Santa Monica: RAND, 1997), pp. 3.

化、逃兵嚴重、兵源不足、士氣低落、住宿問題困窘等等。<sup>5</sup>也正因為在這段過渡時期裡，俄羅斯缺乏一套完善、成文的法律基礎，讓總統個人有很大的施展空間，得以不受法律拘束。葉里欽個人的政治性格便深深左右了軍事改革工作的成敗，學者布蘭克（Stephen Blank）認為葉里欽所有施政的考量皆只在於維持甚至擴大他個人的權力，絕對不會讓軍事權力過度集中危及他的權威。布蘭克指出：

葉里欽總統根本無心推動軍事改革...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政策機制簡直是一塌糊塗、亂七八糟，毫無一套完備的政府結構來貫徹國防政策...許多俄羅斯人民認為他們已經擁有了文人控制機制，因為總統葉里欽是文人。但是這種控制模式是既無效率也欠缺民主的。所有軍事改革的相關計畫說穿了不過紙上談兵，因為這涉及到整個指揮控制體制的根本改變，也會進而限制葉里欽的權力。<sup>6</sup>

布蘭克言下之意，在於即使裁減軍備、軍種合併、推動武裝力量轉型等目標早已是軍事改革的既定方針，但是葉里欽仍然會為了鞏固自身的政治權力而頻頻更換軍事高階領導階層，其中有些人甚至打從心底根本不認同上述的改革目標。在這樣的前提下，軍事改革政策自然無法連貫，成效也大打折扣。第一次車臣戰爭的陷入膠著、庫斯科號沉船事件（the Kursk disaster）在在顯示出俄羅斯武裝力量的管理及應變上已百病叢生；而第二次車臣戰爭雖然連戰皆捷，然而出動的兵力卻是第一次的三倍—九萬人，<sup>7</sup>也讓人有點「殺雞焉用牛刀」之疑。綜觀來看，在葉里欽的總統任期裏，有許多強勢部門先後嶄露頭角、爭取發言權。他們多半是存在於政府體制之中，彼此間積極地相互競爭、辯論政策，以求影響俄羅斯的對外政策與國家安全方針。外交部與國防部就是最顯眼的例子，其他強勢部門間的互相傾軋也是方興未艾、此起彼落。一位俄羅斯分析家指出：

在民主俄羅斯裏，只要是擁有權力的政府部門都自視為「政治局」（Politburo），並且都覺得有權力去追求自己的對外政策。然而，幾個這樣的「政治局」出現在行政機關，它們不允許外交部去制定出一套完整清楚、協調一致的對外政策方針。<sup>8</sup>

<sup>5</sup> F. Stephen Larrabee and Theodore W. Karasik,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Decisionmaking Under Yeltsin* (Santa Monica: RAND, 1997), pp. 3.

<sup>6</sup> Stephen Blank, *The Russian Military: Is Time Running Out?* (Washington D. C. : 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1998), pp. 1-9.

<sup>7</sup> Mark Galeotti, "Eastern Watch: The Russian Army in Chechnya,"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11, 12, (Surrey: Dec 1999): 9.

<sup>8</sup> Yevgeni Bazhanov, "Top Priorities fo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Times* (Moscow: Oct 1995): 33.



國家安全政策系統上壁壘分明的兩方往往訴諸於戰略層面或是經濟層面兩大立論基礎，偏偏維持國際戰略均勢與發展國家經濟永遠是天平的兩端。支持與反對裁減整併武裝力量的兩股勢力彼此不斷拉扯倒也無可厚非，畢竟這是各為其主。不過制度上缺乏有效決策機制，卻讓雙方益發扞格、派系傾軋不斷！1999年7月，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先後簽署了「國家飛彈防禦系統」以及「戰區飛彈防禦系統」部署準備計畫，無視於當初所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約束，<sup>9</sup>與葉里欽積極推動裁減戰略武力的努力無異背道而馳！2002年6月13日，美國憑藉國力強大悍然宣布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全力發展兩大飛彈防禦系統。習慣冷戰舊思維的人莫不敵愾同讎，將之視為對俄羅斯國家利益的挑釁與威脅，身為國會中溫和派學者的國家杜馬國防委員會（the State Duma's defence committee）副主席阿巴托夫（Alexei Arbatov）就說：「俄羅斯應該重新檢視關於發展戰略武力的計畫。」又強調俄羅斯責無旁貸，必須持續投資經費在「我們擁有技術優勢」的領域，言下之意就是戰略武力，特別是陸基洲際彈道導彈。阿巴托夫認為俄羅斯有必要再將戰略火箭軍恢復為獨立軍種，並且要重新配備相關的武器裝備。他的觀點是保衛國家安全首重保衛工業中心與都市，而戰略火箭軍最有能力承擔這個責任。更何況，歐洲國家、日本以及南韓等國都在這個領域上，對與俄羅斯保持合作關係感到高度興趣。<sup>10</sup>阿巴托夫還大聲疾呼，認為俄羅斯至少需要4500枚核彈頭才能維持同美國的戰略均衡。軍事觀察家格拉克維茲（Yury Gladkevich）則指出「克里姆林宮若將國家飛彈防禦計畫單純視為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威脅，勢將引起新一波的美俄軍備競賽！」<sup>11</sup>俄羅斯著名軍事分析家里托夫金（Viktor Litovkin）一語道破要俄羅斯全力裁軍為何如此困難：「俄羅斯軍事改革工作延遲的最大原因，莫過於新美國霸權崛起的一些舉止。」

此外，也是從戰略均勢的角度做思考，大陸學者王鄺久將美俄戰略對峙歷史分為三個階段：

---

<sup>9</sup> 王鄺久，「美俄裁減戰略武器的進程及趨向」，*現代國際關係* 8（北京：Aug 2000）：14-6。

<sup>10</sup> “Russian Mp Thinks Russia Should Review Its Programme For Developing Strategic Forces,” On-Line Pravda, <http://english.pravda.ru/politics/2001/12/17/23823.html>.

<sup>11</sup> Ian Traynor, “Moscow delays military revamp,” *The Russia Journal*, <http://www.therussiajournal.com/index.htm?obj=4098>.

- 1 • 共同構築制約基礎期（1964-1972年）。從1964年10月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總書記開始，直到談判「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 I, SALT I）之前，美蘇雙方彼此仇視，在核子武器以及太空領域展開一場空前激烈的拉鋸戰。核子武器的殺傷力及投射技術與日俱增，世界和平面臨極大威脅。直到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之後，雙方才願意開啓談判大門。在此之前美蘇兩國可說是陷入了「安全困局」，彼此都在追求虛無飄渺的所謂「核武優勢」，無形中相互制約形成了「恐怖平衡」。不過絕大部分軍事學者皆承認此階段美國的戰略優勢仍是蘇聯難以望其項背的。
- 2 • 討價還價期（1972-1992年）。從1972年5月26日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及同年11月展開的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開始，直到1993年1月於莫斯科簽訂第二階段裁減戰略武器條約前夕，這段期間美蘇（俄）終於決定認真談判。雖然過程中兩造各懷鬼胎、互不信任，暗中較勁的狀況時有所聞，然而在裁減戰略核子武器上仍然陸續有突破性進展，其中尤以戈爾巴秋夫時期進步最速。不過，美蘇（俄）雙方終究無力負荷永無止境的軍備競賽，世局的穩定也開始出現曙光。在第二階段裁減戰略武器條約中規定美俄要在2003年以前（即條約簽署後十年內）將兩方倉裏的核彈頭總數銷減到1700至1750個。這個數字雖然依舊駭人，但實已非昔日冷戰最高峰時可比了。只是自始至終，美俄從未開始履行該約，猶如空中樓閣不具實質意義。<sup>12</sup>
- 3 • 美國擴張期（1993年迄今）。之後美國不斷乘勝追擊，美俄戰略均勢迅速向美國一端傾斜，俄羅斯無力可回天。波斯灣戰爭之後，美國認為有必要開始研究飛彈防禦系統，以便遏制類似伊拉克（Iraq）之流的「流氓國家」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構成威脅。<sup>13</sup>

美國的戰略優勢獨步全球，然而這是否代表著俄羅斯必須急起直追？至少「俄羅斯雜誌」（The Russia Journal）軍事評論家高茲（Alexander Golts）不這麼認為。他曾嚴詞批判主張繼續維持甚至擴張俄羅斯戰略武力的那一群人：

這些人彷彿自視為冷戰的勝利者...克里姆林宮這些權貴以及將領們被奉承慣了，他們還把腦袋停留在蘇聯時期國力強大的歷史記憶中。然而新美國政權卻已經對我們的軍事造成相當強大而負面的衝擊。<sup>14</sup>

言詞中道盡了強大軍備對俄羅斯經濟已形成莫大負擔的無奈，甚至情形已經嚴重到不容坐視的地步。俄羅斯唯有擰節軍事支出才能救亡圖存。在可預見的未

---

<sup>12</sup> “Russia, USA signed START II 10 years ago,” On-Line Pravda, 3 Jan 2003, <http://english.pravda.ru/diplomatic/2003/01/03/41576.html>.

<sup>13</sup> 王鄺久，「美俄裁減戰略武器的進程及趨向」，*現代國際關係* 8（北京：Aug 2000）：14-6。

<sup>14</sup> Ian Traynor, “Moscow delays military revamp,” The Russia Journal, <http://www.therussiajournal.com/index.htm?obj=4098>.

來，支持戰略上俄羅斯要繼續抗衡美國優勢與反對的兩方，絕對會繼續對陣並引發新的政治效應。

[研究方法：研究途徑, 研究理論, 研究方法]

[methodology : approaches, theories, methods]

### 克里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

「克里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Kremlin politics approach)。業師王定士博士認為，原蘇聯及俄羅斯領導階層在制定各項重大決策的過程中，不斷進行意見溝通、政策辯論以及利益交換等活動。而在過程中所運用之戰術，諸如派系聯盟、政策辯論、溝通與說服技巧、鬥爭策略以及妥協技巧等等，可統稱為「克里姆林宮學」(Kremlinology)。<sup>15</sup>在關於戰略火箭軍裁併與否的政治角鬥中，雙方都在爭奪「議題詮釋權」，以為己方陣營的種種政治動作披上一層「正當性」的外衣。支持戰略火箭軍維持甚至擴大現存編制的一方，例如聯邦安全會議秘書斯科科夫 (Yuri Skokov) 與謝爾蓋耶夫領導的國防部，就會以「嚇阻戰略」為出發點，強調該軍種對於俄羅斯國防的重要性；而反對的一方如克瓦什寧領導的總參謀部，則高揚「發展經濟」的旗幟，認為戰略火箭軍的現存規模只會讓國家經濟不勝負荷，必須再行縮編。當然，不同政策偏好下真正的目的仍在於國家安全決策權，自然種種政治鬥爭、政策辯論與利益交換層出不窮。

克里姆林宮學的分析途徑又分為兩種型態：「純權力動機學派」(“pure power” motives) 和「政策偏好學派」(policy preferences)。純權力動機學派視克里姆林宮政治鬥爭純為機會主義、拜占庭式 (Byzantine) 的政治遊戲，政策的取

---

<sup>15</sup> 王定士，「車臣戰爭研究：車臣戰爭決策中的克里姆林宮政治因素」，*俄語學報* 2 (台北：May 1999): 234-5.

捨僅供用來勝過或妖魔化政治對手而已。純權力動機學派的發展主要用來觀察史達林治下的克宮拜占庭式政治鬥爭。政策偏好學派則興起於 1960 年代，其觀點是政治鬥爭終非克里姆林宮政治生態的全貌，範圍應該涵蓋領導階層個人對於如何解決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問題之政策辯論與政策堅持，單一政治人物的言論及其行為型態也應納入考量，<sup>16</sup>例如葉里欽與普欽對國家安全政策的理念與決策模式。本文將依循政策偏好學派的研究途徑，來剖析戰略火箭軍議題上，克里姆林宮內的所有政治動作。

### 嚇阻戰略研究途徑

「嚇阻戰略研究途徑」。美國學者史考特夫婦（Harriet F. Scott & William F. Scott）曾在「蘇聯武裝力量」（The Armed Force of USSR）一書中指出，蘇聯在赫魯雪夫時期，普遍認為核子武器與導彈的出現已徹底改變了戰爭的本質，赫魯雪夫甚至強調只有依靠核子武器才能打贏敵人，其他武裝部隊的最大任務就是支援進行核子戰爭，而非核子武器協助其他軍種進行作戰。而且未來的戰爭一旦爆發，必定就是毀滅性的全面戰爭，在極短時間內將會毀掉許多國家和民族，所以蘇聯也要因應這樣的戰爭趨勢變化進行軍事準則的更新。新的軍事準則將同時具有軍事意義及政治意義。在政治上，蘇聯憑恃軍力強大，能夠嚇阻帝國主義國家擴張的野心，不敢任意輕啓戰端，所以全面性的大規模毀滅戰爭可能性已有效抑制。<sup>17</sup>而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闡述所謂的「嚇阻戰略」

（Strategy of Deterrence）意指：

嚇阻戰略，就是為獲得最大限度之嚇阻效力，同時冒著最小限度的危險，而又合乎成本效益的計算之戰略。<sup>18</sup>

蘇聯在布列日涅夫時期，已經憑靠戰略火箭軍的陸基戰略武力取得最低嚇阻

<sup>16</sup> George W. Breslauer, *Khrushchev and Brezhnev as Leaders: Building Authority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pp. 8-9.

<sup>17</sup> Scott, Harriet F. & Scott, Williams F., *The Armed Force of USS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pp. 40-7.

<sup>18</sup> 季辛吉著，紐先鐘譯，*核子兵器與外交政策* (台北：正中，1983), pp. 106。

的基本條件，兩極體系的恐怖平衡業已確立。根據學者布拉迪（Bernard Brodie）所言，恐怖平衡之所以成立，乃是因為蘇聯的戰略武力較之美軍雖屈居劣勢，卻已經達到對美國構成「最低嚇阻」（minimum deterrence）的局面。所謂的最低嚇阻構成條件如下：

- 1 • 最低嚇阻應掌握一項優勢兵力，能保證溫和之報復。
- 2 • 必須認知嚇阻為相對性的，也就是說嚇阻經常是高度機動性（high degree of motivation）。而潛在敵人對己方毀滅能力的主觀感受和客觀認知，也直接影響到嚇阻的有效性。
- 3 • 一旦嚇阻失敗，仍具有足夠武力去進行一場有效的全面戰爭。
- 4 • 報復武力若有可能，要具備絕對壓倒性的報復能力。<sup>19</sup>

在 1978 年，哈佛大學學者奈伊（Joseph S. Nye, Jr.）就曾以「核子學習與美蘇安全體制」（Nuclear Learning and U.S. – Soviet Security Regimes）為題目發表論文，文中列舉出五個共同認知領域（area of common knowledge），依序是：毀滅性能力、管制問題、繁衍問題、軍備競賽穩定以及嚇阻能力等等。<sup>20</sup>蘇聯與美國在軍備競賽以及限武談判上的重點就在於這五個共同認知領域上。

我們知道核子武器的最大作用是其威脅能力，而非真正的使用效果。所以，在以「嚇阻戰略」作為研究途徑的同時，核子武器使用前提必須是下列幾點：

- 1 • 實行「嚇阻」的一方和欲嚇阻的「對象」，必須對雙方的每一項行動，進行成本效益（Cost and effect）的理性判斷。
- 2 • 核子武器報復能力，是為了「防止」侵略行為，而非「刺激」侵略行為。
- 3 • 不論雙方社會制度有多大差異，必須認知「保存人類文明」是兩國之共同利益。
- 4 • 雙方應該嚴格管制對使用「戰略武器」的決策權。<sup>21</sup>

雖然歷任蘇聯領導人斤斤計較於戰略核子武器的「第一擊」（First-Strike）、「第二擊」（Second-Strike）或是「先攻」（Preemptive Strike）、「報復」能力，但是絕對不是以使用戰略武器為首要目標，而是將之視為政治工具爭取國際舞台上的發言權，並且加以嚇阻美國。當然，隨著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衰退，俄軍已無力作全球戰略佈局，嚇阻戰略的定義也必須與時俱進，改以維持俄羅斯領土完整、

<sup>19</sup> Bernard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77.

<sup>20</sup> 畢英賢，「蘇聯的新政治思維與對外政策」，*問題與研究* 27, 2, (台北：Nov 1987): 21。

<sup>21</sup> T.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312-3.

符合當前國家利益為圭臬。至於什麼是當前國家利益？俄羅斯武裝力量又該維持在怎麼樣的規模才算是「最適規模」，有能力應付領導人所交託的任務？這些課題成了俄羅斯國家安全政策領域論辯的焦點。主張維持甚至擴大戰略火箭軍規模的一方，所持論點就是嚇阻戰略，認為戰略火箭軍絕對是嚇阻美國追求霸權地位、北約繼續擴張勢力範圍或是因應任何大規模軍事威脅，俄羅斯最經濟實惠的選擇。